

关于亚洲近代化的笔记

(代 序)

前 言

大家都知道 在日本的近代史上 如何理解明治维新及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家的性质，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所谓“ 资本主义论争 ” 中提出来的。那次论争不仅对历史学，而且对以后日本整个社会科学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以后的研究虽然在历史学的各个领域加深了精细度，但当时所提出的根本性的问题依然未得出结论。

在 30 年代的论争中 参加《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的人们（ 讲座派 ）认为明治维新的本质不是资产阶级革命 而是集权主义的建立 明治二十二年 1889 年 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通过是集权主义的确立。他们的观点的出发点是：当时日本社会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革命 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这种革命将迅速地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与此相反 参加《劳农》杂志的人们（ 劳农派 ）则认为明治维新的本质基本上是资产阶级革命 当前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论争本身就是这样围绕着当时的“ 当前的革命性质 ” 而提出来的。但在如何理解近代日本的性质方面 包括并不研究革命问题的人们在内，都是当作整个社会科学的问题接受的，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围绕日本的近代国家的性质展开了上述论争的原因是：当时

的日本虽然拥有已达到垄断资本阶段的发达的工业，但在政治形态、农地关系等方面仍然残留着许多与欧美各国不同的、被认为是“前近代的因素”。特别是战前日本农地的 60%是处在地主佃农制之下。在地主佃农制下，大多数情况要收取收获物的 50%~60% 的实物，而且基本上不承认近代农业制度所特有的租地人的权利。讲座派认为地主佃农制的本质基本上是封建的，劳农派则认为是“变形的资本主义”。

关于日本战前的国家性质之所以存在以上不同的见解，其原因除了其复杂性外，还由于日本近代国家的成立与欧洲近代国家的成立有着很大的差异。在最早成立近代国家的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是由以市民阶级、资产阶级为核心的势力进行的。资产阶级势力掌握了政权。而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但采取的形式与西欧的资产阶级有着极大的差异。不论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或是在其后不久的当权者当中，都很难看到在西欧出现的那种“市民阶级”。

由于以上的原因，围绕着日本的近代国家的成立及其性质而展开了长期的论争。笔者对这些问题有以下的看法：

(1) 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的发展是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的成立作为出发点的。亚洲的近代化也是作为这种发展的一环而进行的，其契机是通过开放港口而被编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的。

(2) 亚洲近代化的动力是土地革命。在当时的东亚一带基本上是通过土地革命而出现近代化的动向（如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朝鲜的甲午农民战争）。

(3) 日本的殖产兴业政策在前期是以官营工厂和半官半民工厂为中心推行的。这和中国洋务运动中的“官督商办”政策基本相同，都带有前近代的性质。但在日本，主要由于自由民权运动的压力，以及政府方面对试行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有所反省，因而在殖产兴业的后期把官营工厂和半官半民工厂抛售给了民间。这是“从上而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它作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出发点。

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4) 明治维新建立了集权主义。与此同时，幕府末期至自由民权时期存在的革命形势虽然没有取得革命的胜利，但通过波拿巴主义而产生了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点上 应当重视 明治十四年的政治变动^①。

(5) 由于明治宪法体制的建立，日本总算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 但仍遗留下民主革命的课题。另外 以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迅速发展为背景，在大正时期出现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过渡的动向 但在世界性的法西斯主义的潮流中 却向法西斯体制发展了，因而战前的日本始终存在着民主革命的课题。

笔者认为明治维新虽是通向日本近代化的出发点，但在这一阶段并没有解决近代国家成立的一切问题，日本近代国家成立的问题还必须包括对自由民权时期加以考察。

在认为战前的日本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这一点上，可以说笔者是继承了旧讲座派所提出的观点。但在以下两点上，笔者对前面所述两派的观点持批判的态度：

(1) 旧劳农派认为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革命，认为战前日本当前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观点回避了对当时的天皇制的斗争和工农联盟的问题。另外认为战前的地主佃农制“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

(2) 旧讲座派认为明治维新是集权主义的成立，认为战前的地主佃农制的本质基本上是封建的。在这些方面可以说是有功绩的，但他们的观点无法说明明治时期及其后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接受旧讲座派主张的人们的观点也不一样，有的认为通过明治宪法而确立的绝对主义体制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也有的认为在某个一定时期发生了变化。但前者等于是把日本近代社会看成僵硬的毫无变化的社会；后者并未说清什么时候

怎样发生了变化，那就等于说日本从集权主义国家不知不觉地就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

笔者把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成立放在明治十四年政治变动至明治宪法通过这一时期。理由是这一时期有着这样三件重大的事实：(1) 革命形势的高涨；(2) 政治上的变革（公布宪法、开设国会）；(3) 经济上的变革（把官营工厂、半官半民工厂抛售给民间，培育民间企业）。在战前的任何时期都没有像这一时期这样集中地进行了如此重要的变革。

亚洲近代化变革的形态——太平天国 革命与明治维新

在考虑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等亚洲的一系列争取近代化的运动时，需要首先探讨一下这些运动采取了什么形态的问题。

日本在考虑近代变革的问题时，长期以来有着这样的倾向，即把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等西欧的变革当作“典型”，并试图以此为标准来考虑问题。其原因是，这些国家在世界上最早建立了资本主义“强国”，日本长时期学习这些国家，并极力想赶上这些国家。这种倾向不仅在统治者方面有，就是在有志于变革的人们当中也表现了出来。因此，在历史学的领域里也产生了这样浓厚的倾向，首先把这些国家的历史过程当作“典型”，试图把其中出现的现象当作标准来衡量其他国家，也包括日本的历史。战后对这种方法虽曾多次作过反省，但未能找出可以代替它的恰当的尺度，所以总的来说，仍旧漠然地袭用旧的尺度。长期以来关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两种观点之所以仍然并行不悖，笔者认为其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在试图把西欧近代化的过程当作典型而硬套其他地区的历史的方法中，主要的观点是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在本质上是市民革命。当然，在战前、战后涉及西方史的这一问题的著作中，也强调了农

民的作用。但就整体来看，不可否认在研究者的内心深处仍然潜藏着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市民革命的影子。其实西欧的自治城市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发达，市民阶级已经勃兴。东方地区与此不同，这样的阶层在社会上并未形成强大的势力，近代的变革当然要采取不同的形式。如何说明这样的历史过程，以前虽曾作过种种的尝试，但还不能说已经很充分。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仅靠西欧的事例是不够的，还必须连同以后的几个地区的事例一并加以考察。

关于这个问题，首先应当重视列宁的有关 1905 年俄国革命的各篇论文。列宁在这些论文中指出：“资产阶级革命是不超出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关于当时的俄国革命，列宁这么说：“这次转变的最主要的手段就是群众性的罢工。俄国革命的特点就在于，按其社会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按其斗争手段来说，却是无产阶级革命。”（《关于 1905 年的革命的报告》）

这些论文提出了许多问题。就是说，即使从“社会的内容”来看是资产阶级革命，也不一定采取市民革命的形态；另外，即使像 1905 年当时的俄国那样，在拥有相当程度成长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情况下，从“社会内容”来看是资产阶级革命，但也可采取“无产阶级革命的形态”，而且即使采取这样的形态，只要它“不超出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那它仍然是“资产阶级革命”。

假定如上所述，资产阶级革命可能有几种形态，那么，谈到东亚是什么形态时将会出现下面值得讨论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根据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的事例，认为它是“土地革命的形态”或“以土地革命为基础的形态”。时代稍后的朝鲜的甲午农民战争（即所谓东学农民战争）也可以列入这一形态。

首先必须要注意的是，这些运动都是在其所发生的国家已被

列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后发生的。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与这些国家过去的农民起义不同的性质。关于这个问题将在后面论述。

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是将彻底的土地革命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作为其基本纲领。这个制度由于接连不断的战斗而未能完全实行，但作为纲领的意义是巨大的。太平天国后来在它的基础上提出了见于《资政新篇》中的那些具体的政策。《资政新篇》的内容涉及很多方面，但其主要点还是要开辟轮船、火车等全国的交通网，奖励开发产业，设置金融机构和邮政、报道机构等。这里所指出的道路正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太平天国革命是一次失败的革命，但它表明了亚洲的近代变革的形态是通过土地革命的形态，在这一点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形态获得继承，由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发展为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终于迎来了1949年的新中国的成立。太平天国革命即使能胜利，也不可能想像在当时能直接成立近代国家，但产生近代国家的前提——统一国家起码是可能的。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就明治维新来说，维新时期的人民斗争的潜流有着要求土地革命的活动。笔者认为，以前学术界一直争论的维新时期“改变世道”^①的本质也是土地革命。也就是说，“改变世道”论指出了农民斗争在维新阶段由“惣百姓斗争”^②的阶段向以“改变世道”为中心的斗争过渡。笔者认为指出这种现象是正确的，但其本质应当看作是一种土地革命的活动。日本在维新时期的土地革命的要求，包括要求否定领主土地所有（要求否定贡租，或要求大幅度降低贡租，事实上等于否定了贡租）和否定地主土地所有（要求归还典押的土地和押死的土地）两个方面，其基本内容都是“把土地交还耕种农民”。

德川幕府末期和明治维新时期，农民斗争提出的口号主要是“改变世道”。故这一时期的农民斗争，往往称作“改变世道”斗争。——译注

② 德川幕府中后期，由村吏领导的反抗领主的农民斗争。——译注

在日本的幕府末期 农民斗争和城市贫民的斗争高涨 这些斗争特别集中在幕府倒台的前后，形成全国性的起义。幕府末期的人民斗争与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的不同之点是，日本没有像太平天国那样的全国性的统一的司令部、纲领和自己独立的军队。其原因是由于日本的幕藩体制这一封建统治组织拥有进行分割统治的机构。因此，必须要把当时各地发生的农民斗争所提出的要求集中起来，研究当时的农民斗争总的究竟有什么样的要求。笔者认为，幕府末期的农民斗争在其潜流中也是有着土地革命要求的，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各种资产阶级变革的要求。土地革命的要求是以要求重新分配土地，否定向领主缴纳贡租、向地主缴纳佃租 以及要求大幅度减少贡租、佃租 事实上是以否定贡租、佃租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其他的要求广泛地涉及到要求自由栽培农作物 自由贩卖农产品和营业自由 以及废除庄屋 组织等封建统治机构和村落机构等。在幕府垮台期间所发生的“会津的改变世道”斗争，人们高度地评价它是几乎全面包含着资产阶级革命纲领的一次伟大的农民斗争。

信州佐久郡八幡村的农民依田铁之助在明治维新时期曾参加赤报队^②，后来又参加过自由民权运动。他在地租改正的前夕曾起草过一个以土地的国有和均分为中心的土地革命的建议书。这说明了土地革命是幕府末期和维新时期的农民斗争的动力。

可以认为 日本争取近代化的斗争的基本形态 在一定的阶段也是以土地革命为潜流的形态。列宁在其《农业纲领》这部著作中说 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发展的最彻底的要求”。笔者认为 在 19 世纪的亚洲，通过土地革命的形态是近代变革的基础。

综合上述，可以认为近代的变革有以下三种基本形态：

德川幕府时期的村吏之长，由领主任命有名望的富裕农民担任，统管一村或数村的纳税等事务。——译注

② 明治维新时期 各地的所谓忧国志士、富农、富商等组成军事力量 统称为“草莽队”。其中著名的为赤报队。后被明治新政权所镇压。——译注

(1) 像西欧那样以市民势力的成长为前提的市民革命的形态。

(2) 像 1905 年当时的俄国那样, 以无产阶级的阶级的和组织的成长为前提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形态。

(3) 像 19 世纪后期的亚洲所出现的那种土地革命的形态。

笔者在前面说过, 近代变革的亚洲形态是土地革命的形态。这必然导致农民斗争的力量将成为变革动力的结论。这样, 我想必然会产生如此的疑问: “那么, 它与封建社会里的一般的农民斗争有哪些不同呢?” 是的, 必须区别“包含在事物本质之中的矛盾”——即作为封建社会本来的阶级对立的因素的农民斗争与作为导致“旧事物的消灭与新事物诞生”的因素的农民斗争。笔者认为从前者向后者过渡需要通过一定的客观条件才能进行, 而其契机就是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关系。

马克思在其很多著作中都谈过, 资本主义成立的前提是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市场是以美洲的发现与非洲南端的返航为契机而获得发展的。旧的生产方式已无法满足新的市场的需要, 在这样的状况下, 使得封建的同业公会性质的手工业向作坊手工业乃至机械生产工业发展; 打倒封建统治正是以这种变化为前提而进行的。从这一点来考虑,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朝鲜的甲午农民战争, 都是在其发生的国家被列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后发生的。

马克思在 1850 年 1 月写的《国际评述》及 1858 年 10 月致恩格斯的书简中说, 资本主义为了其生存, 不得不争取世界市场的形成, 并说当时世界市场正在东亚形成。由此表明, 当时的东亚所处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 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这部著作并不是只谈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恩格斯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这篇论文中, 把“16 世纪的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17 世纪的英国革命、18 世纪的法国革命”称作“资产阶级的三次大起义”, 并说“16 世纪

的德国有可能通过这些运动而进行资产阶级的变革，指出其中一个原因是 尽管当时已可往返好望角 但世界贸易的主要通路仍然要经过德国。

如上所述，19 世纪后半期亚洲所面临的形势是与近代的变革相联系的，马克思对这一点表示了极大的关心。马克思在 1850 年所写的《国际评述》中注意到鸦片战争的结果 中国已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 以及随之而产生的人民斗争的激化 并用极其谨慎的语言指出 这些动向可能会导致‘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的结果。从这些点可以了解，在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一部分的国家，该国的人民斗争已由单纯的封建社会所特有的阶级对立的表现 逐渐形成了具有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这一与以前不同的新的意义。所以笔者把这些国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之后所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明治维新、甲午农民战争中的农民斗争与在此以前的农民斗争区别开来。

恩格斯举出‘德国农民战争’与以前的农民起义有区别的另一个要点是有‘无产阶级因素’的参加。在这一点上 笔者想指出太平天国革命中矿山工人与城市贫民的作用，以及在明治维新时期的人民斗争中，与农民起义同时发生的城市贫民的暴动所起的巨大作用。

以上论述了亚洲的近代变革的本质及形态。

明 治 维 新

上面已经论述了亚洲的近代变革与西欧的相异点。但亚洲的三个例子作为革命本身来说都失败了，太平天国革命不消说，就拿明治维新的运动来说，仅就以人民斗争为中心的观点来看，也是属于失败的例子。笔者在前面已经指出，明治维新时期的人民斗争与太平天国革命的相异点是在于没有统一的司令部、纲领及自己的独立的军队。但我认为这种萌芽还是有

的。我认为在幕府倒台后不久一度发展成相当大势力的赤队的运动就是这种萌芽，就是不以藩为主体的人民自己独立的司令部和自己独立的军队的萌芽。这个运动被成立不久的明治政府当作“伪官军”彻底消灭了，这表明它的存在对新政府是多么危险。

不过，重要的一点是，与作为旧政府的清朝在太平天国革命中最后没有崩溃相比，明治维新的情况是作为旧政府的幕府终于垮台了。其原因是当时的欧美的干涉势力使尽一切力量来扼杀太平天国革命和维护清朝政府的存在，日本乘着这个空隙而实现了推翻幕府。旧政府的垮台给以后的日本带来了与中国相异和实现近代化更多的可能性，但在当时也不可能立即产生资产阶级国家。日本拥有分割的统治组织，在幕府末期的矛盾激化中，是以反对幕府的几个藩（其核心是萨摩、长州二藩的联合）的形式展开了讨幕运动。接着在幕藩政府垮台后，以萨、长二藩为核心的雄藩联合的形式产生了新政权。这些藩的实权虽然已由旧门阀阶层转移到下级武士的手中，但不能立即确定这样产生的雄藩联合的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不过，旧政权幕府垮台，产生了作为近代国家前提的统一国家，其意义是重大的，因为这是以后日本社会变化的起点。

1868 年明治元年新成立的政府是雄藩联合政权。但当时日本国内外的形势不可能允许这个政权长期存在下去。在维新时期内战的过程中参加内战的各藩包括取得了胜利的藩都陷入了极度的财政困难难以继续存在下去。特别是各藩购买的军舰已成为它们极大的财政负担。在幕府末期各藩的旧的门阀秩序已经面临崩溃在内战的过程中又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崩溃。不过促进藩解体的最大原因还是幕府末期以来连续不断发生的人民斗争。在幕府倒台的前夕激烈的农民斗争是幕府垮台的重要原因但农民自己的政权自己的军事组织还在萌芽时期就遭到摧残方便了雄藩联合的新政权的成立。可是农民斗争在新政权成立后仍然不断激

化如最大的藩——加贺藩的“蓑衣暴动”^①和新政府直辖地飞驒的“梅村暴动”^②等大规模的斗争，事实上已经摧毁了各地的统治机构。当松代藩等所在地的北信一带被卷入农民斗争时，新政府曾考虑废除该藩，这表明旧的统治机构已经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当时新政府的实权人物之一的大隈重信在向政府提出的建议书《全国一致之论议》中说，分散的军事机构和统治机构已不能举办实事，其解决的办法是，“使各管之兵统属于兵部，庶务百事统属于民部，财政统属于大藏”。这一主张的核心是建立统一的军队及支持这种军队的统一的财政和统治机构。由于全国人民的压力，立足于雄藩联合原则上的当权者也不得不着手解散藩。这一时期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改革，也是由于这样的人民的压力。明治五年（1872年）大藏大辅井上馨写道：“租税……若不改革，人民必将于当年冬季提出，故不得不决心改革。”当时推进秩禄处理工作的木户孝允于明治六年（1873年）说：“……取消此秩禄非一朝一夕能议论清楚，亦非数年能得到好处。但若不建立今后之目标，让岁月空逝，人民终将产生剥夺之议论，那时将造成政府一大困难，皇国之中产生不和，华族亦不能保其品位。”废藩置县、地租改正和秩禄处理等一系列改革对日本的近代化和资产阶级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这里无需赘述了。这些改革首先是在当时的人民斗争的压力下，当时的政府不得不实行的。

笔者认为，通过这些措施，明治政府才基本上具备了集权主义的性质。并认为只有在基本上具备了这样的性质之后，才可能有以后的变化。其中关于地租改正的评价，必须要补充几句。我认为地租改正是幕府末期以来以土地革命为潜流的人民斗争的结

明治初年在富山县新川郡一带爆发的一次“改变世道”的农民起义。——译注
明治初年飞驒地方反对知县梅村速水的人民起义。起义被镇压，梅村速水也被明治政府革职。——译注

果是在以地租改正本身为目标的斗争中 对富农、自耕农承认其土地私有权和减免其若干贡租；是在这个限度内从封建统治下获得的解放 其意义是重大的。但笔者还认为 就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来说 还残留着半封建的关系。

自由民权运动

如上所述，笔者认为通过明治维新而成立的政权的性质是集权主义 认为明治维新作为日本走向近代化的起点 其意义是重大的。但在这一阶段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或尚未提出。举一个例子，如对近代的政治形态的要求，在明治维新的运动中就未曾提出，在自由民权运动中才提出了这一要求。所以在明治维新的阶段只是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与此同时 值得注意的是 欧洲很多集权主义国家是以旧政权的延长的形式而出现的。相反，在日本不是旧政权幕府集权主义化 而是打倒了它 产生了集权主义政权。这一点使得它的形态比延长的集权主义更为彻底，同时成为其成立后不久产生向近代国家过渡的动向的原因。

明治维新初期政权的性质是集权主义。这一点也表现在前期的殖产兴业的政策中。前期的殖产兴业是以官营工厂和半官半民工厂为中心来推进的。官营工厂是在继承幕府末期的幕府经营的工厂和藩营工厂的基础上兴办的。前期殖产兴业政策与当时中国洋务运动中的“官督商办”的企业具有共同性。当时日本的当权者从中国的洋务运动中学习了很多东西。这些政策的意义是在于为以后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其本身不是资本主义的政策。马克思曾把普鲁士集权主义的振兴产业政策同英国资本主义的振兴产业政策加以比较：“官僚监护制度对工业来说无疑是死路一条。”

前面说过 通过明治维新而成立的集权主义政权 未能像英法

的集权主义那样长期存在。这是由于日本国内外形势不允许它长期存在。旧政权在人民斗争的风暴中垮台，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进一步发展了日本的资本主义因素。另外为了对抗当时欧美对亚洲施加的压力，统治者也痛切地感到要在“富国强兵”方面取得实际成效。

自由民权运动是在形势比明治维新时有着进一步发展的状况下展开的。政治与经济的状况不仅比以前更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的发展，而且到这一时期，介绍了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和近代的政治，明确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组织和方向等。当时通过自由党的机关报建立了理论阵地的经济学家田口卯吉指出，集结在商法会议所里的新型的商人与“东京的大多数商人”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可见资产阶级已获得相当大的成长。自由民权运动既是广大阶层争取政治权利的运动，同时也包括了具有土地革命要求的贫苦佃农阶层的要求，以及提出自由进行经济活动要求的资产阶级企业家的要求等。自由党的机关报《近事评论》说：“如不防止有司官僚之干涉，则难以兴办民间之事业。”另外，自由党机关报《自由新闻》的社论主笔田口卯吉认为：“何谓劝业？是谓政府从事制造乎？此乃实际阻碍民间同种产业之兴起，决不能达到劝业之目的。”他们都反对以官营工厂和半官半民工厂为中心的政策。

自由民权运动以明治十四年（1881年）抛售北海道官有财产事件为契机，出现了盛大的高潮。在政府内部，也出现了大隈重信等与资产阶级动向共鸣的势力。当时处于政权核心的很多政治家都认为这样的状况“使人联想到法国革命前夕的情景”。

面临这样的危机，明治政府采取了所谓“明治十四年政治变动”的措施。在这一过程中，把大隈重信赶出政府，同时以诏敕的

田口卯吉(1855~1905)，经济学家、文明史家。号鼎轩。江户（东京）人。曾创办《东京经济杂志》，提倡自由主义经济学，鼓吹民权，当过众议院议员。著有《日本开化小史》、《中国开化小史》等，编辑发行《国史大系》、《群书类从》等。——译注

形式提出 保证十年后颁布宪法和开设国会。更为重要的是 以这次事件为契机 把官营工厂和半官半民工厂全部抛售给民间 殖产兴业政策逐渐改为以扶植民间企业为中心。但过去的研究一向把这两方面分裂开来论述。

本书第 53 页的图表表明当时实行抛售的情况 可以了解抛售是集中于明治十四年政治变动至明治二十二年 (1889 年 颁布宪法的期间。

如前所述 笔者认为 从这时以后 日本以由集权主义向波拿巴主义转变的形式向资本主义国家过渡。资产阶级发展的道路不是“官督商办”型的官营工厂和半官半民工厂，而是扶植民间企业。——这是以田口卯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要求。在棉纺业座谈会上 民营纺织工厂的代表曾经严厉地批评说 官营工厂“根本不可能作为模范工厂”；只表明把棉花变为棉纱的形式 它能做的只是如此而已”。另据《工部省沿革》记载 担任殖产兴业工作的官吏也认为：“不如贷与人民 使其自由营业 那时方能收支相抵 事业日益扩大。而当时有人感到这种情况将会阻碍富国强兵的实现。

从以上的观点来看，我认为可以考虑“明治十四年政治变动”与通过抛售官营工厂来扶植民间企业是如何相结合的。在这次事件前后，可以说明治政府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承认从下面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那就必须要向自由民权运动全面投降。而这对明治政府来说是不可能的。既然这样 剩下的道路就是通过抛售官营工厂和半官半民工厂“从上面”一举制造出顺从于权力的大资产阶级，使他们和地主共同作为自己的权力基础 这样在数年后面临开设国会时 就可重新建立新的统治体制（波拿巴主义）——笔者是这么认为的。我认为政府反对民权派要求 立即 颁布宪法和开设国会 而要放在十年以后 其原因就在这里。(1)革命形势高涨；(2)政治上的改革；(3)经济上的改革。所以笔者重视这三大重要事实同时出现的“明治十四年政治变动”。

在这次变动以后，自由民权派的阵营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板垣退助等自由党上层解散了自由党。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革命已经结束”。在这以后，“激进派”的运动激化，这是由于在民权运动中，小资产阶级与以土地革命为主流的佃农、贫农的势力虽然孤立，但仍坚决要求彻底的民主革命，并为此而进行了斗争。其典型就是著名的秩父事件中的农民起义。

战前天皇制的本质

如上所述，笔者认为以“明治十四年政治变动”为起点，由明治宪法的颁布和国会开设而完成的体制的本质是波拿巴主义。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和《跋“德国农民战争”第三版》等论文中说，资产阶级革命的德国三月革命虽然失败了，但由于它的压力，普鲁士“专制君主国在急剧地过渡到波拿巴主义君主国”，它“普鲁士专制君主国——引用者，当时仍然是个半封建的国家，而波拿巴主义则无论如何都是以消除封建制度为前提的现代国家形式。”笔者认为当时德国的例子基本上也适合于日本。

关于认为明治宪法体制成立以后，日本已成为近代国家的主张，我想会有不少反论。其理由是，在这以后一直到日本战败，日本掌握政权的人大多是军阀、官僚，资产阶级势力基本上没有直接掌握政权，而且广泛存在着地主佃农制等各种封建因素。可是，恩格斯在上述《论住宅问题》中说：“不论在旧专制君主国中或者在近代波拿巴主义君主国中，实际的政府权力都是掌握在军官和官吏这一特殊等级的手中。”而且列宁在论文《波拿巴主义的开始》中将其规定为“依靠军阀、军队中的坏分子的国家权力”。列宁在《农

自由民权运动中的一次重要事件。1884年11月，一部分自由党员在埼玉县秩父郡动员贫苦农民，发起暴动，袭击警察、郡公所和高利贷者，很快遭到镇压。事件后判处重罪者296人（其中死刑7人），轻罪者448人，罚款者2642人。——译注

业纲领》中还进一步说：“关于一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为了取得彻底的胜利 是否必须成为农民革命 对此还不能说些什么。”笔者认为 列宁的这些话并不否定广泛残存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遗留下土地革命课题的国家能够转化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可能性。残存着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并不妨碍通过波拿巴主义向近代国家的转化。

还有一个问题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举出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均势 和资产阶级 对无产阶级的恐惧 作为波拿巴主义的基本条件。在自由民权时期的日本寻求这样的条件是否为时过早？但是，正如恩格斯在《新莱茵报》这篇论文中所说的那样：“决不是对德国的无产阶级已有的东西，而是对其将要形成的东西 以及对法国的无产阶级已经形成的东西感到恐惧 资产阶级只是在和君主制及贵族制的某种妥协、甚至是卑劣的妥协中才得以拯救的。”使德国实现波拿巴主义的“对无产阶级的恐惧”可以说也不是对德国无产阶级的现实的恐惧，而主要是由于从法国的现状联想到德国的未来。

可以说当时日本的统治阶层也是由欧美的无产阶级的现状而联想到了日本的未来。对无产阶级的恐惧，不仅在集权主义统治者方面有，在资产阶级方面也存在。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曾经是自由民权运动斗士的河野广中 说：“在日本的政治家中 有人从欧洲引进了有利于他们富人的制度”，因而产生了社会党、共产党和虚无党。“河野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 认为过于实行有利于富人的政治‘富人与穷人争夺权势的时代就会到来’主张一定要不使这样的时代到来。笔者认为这里正表现了当时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恐惧。像日本和德国这样的国家，与有些国家由于该国本身内部的成熟而实行向资产阶级国家过渡的情况有所不

河野广中（1849—1923） 号磐州 福岛县人。自由民权论的急先锋 在福岛事件中被捕入狱。后任众议院议长、农商务大臣。晚年从事普选运动。

——译注

同 它们除了本身内部的原因外，一边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方面大量吸收外国的东西，一边实行向资产阶级国家过渡。在这样的国家，在阶级关系上必须要考虑到有若干差异。应当看到这一点在日本特别强烈。

如上所述 笔者认为日本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成立 基本上是由集权主义向波拿巴主义转化的形式进行的。这种情况下的波拿巴主义并不是法国的波拿巴主义，而是德国的波拿巴主义。关于这一点 应当考虑的是 在战前的资本主义论争中 服部之总 在其初期的著作《明治维新史》中陈述了与此相似的观点。但服部以后撤回了自己的主张，认为明治宪法是集权主义的宪法。服部本人对此所作的解释 据笔者看 反而没有说服力。而且他在战后所发表的论文中，也令人感到并没有坚持自己过去的主张。服部随意撤回自己的观点 看来有种种的原因。但据笔者看 服部可能是为了要与认为战前日本革命的课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一致 因而认为必须要把明治宪法规定为集权主义的宪法。但是 如前所述 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 在发生波拿巴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情况下，也可能把该国革命的当前任务规定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认为这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表明的事实。

因此可以这么说 日本的近代国家就是这样成立的 并在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出现了由波拿巴主义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过渡的动向，但它中途停止了，变成了法西斯主义。

服部之总（1901~1956）历史学家。岛根县人。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讲座派”的重要成员。对明治维新史的研究卓有成绩 著有《历史论》、《明治维新史》和《亲鸾笔记》等。——译注